

爱
·
美
·
死

日本
文学
论

李德纯
著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爱·美·死

——日本文学论

李德纯 著

中国出版社

(京)新登字022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美·死: 日本文学论/李德纯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4.7

ISBN 7-80088-566-6

I. 爱… II. 李… III. 文学研究-日本 IV. 131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5122 号

爱·美·死

—日本文学论

李德纯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黄城根南街 9 号 邮政编码 100032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9.8125 字数: 240千字

1994年7月第一版 1994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定价: 10.00

ISBN7-80088-566-6/G·109

前言

日本文学流派纷呈，更迭频繁。余素愚拙，徜徉其间经年愈感目不暇接。早年留学东瀛学文，不过是觅几分逸致，间或秉烛夜读，无非兴之所至，信手拈来以遣闲兴，从未敢奢望深于此道。

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春风吹拂华夏大地，久积于心的翻译研究夙愿难以压抑，大有漫卷诗书喜欲狂之慨；国门洞开，遂穿梭于赤县与扶桑之间，寻师访友，与往昔封闭式的学究生活大异其趣，增添了生活体察与感情积累，即或如此，扪心自问，也只是稍窥其间门径而已。

近来，把近年习作汇集成册，细细浏览，日文中所称“走入鬼籍”的已故作家，他们的音容笑貌恍如眼前，能不黯然？！我无法忘记享有世界声望的文坛巨擘井上靖，慨允为拙著日文版写了篇火一样燃烧的序言；“三大才女”^①之一的有吉佐和子在她“堀之内”（地名）宽阔书房里，倾谈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交替递嬗，发人睿智；战后派代表作家野间宏侧身慈惠大学附属医院病床，聚精会神为笔者论文挥笔斧正；素有日本文坛“四大怪杰”^②之称的安部公房，因心脏病猝发溘逝前在京王饭店，对日本文学的回顾与展望直抒胸臆，深为他的论断所折服……流光容易把人抛，如今又是一年春草绿，往事如昨，不觉凄然。

时下仍活跃在文坛的学者型作家司马辽太郎堪称日本文坛

① 三大才女：有吉佐和子、山崎丰子、曾野绫子。

② 四大怪杰：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安部公房。

③ 日文：泰斗。

“大御所”^③，时相称兄道弟，鱼雁传情，洋洋洒洒十几张素笺，字里行间洋溢浓烈的感情内涵；谦逊儒雅的日本笔会会长尾崎秀树，对笔者滞日期间所给予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华丽的家族》蜚声我国影视圈的山崎丰子，每次见面总是在友好气氛中坦率交换意见；寡居名胜古迹镰仓的川端康成夫人秀子女士，情味并浓的文坛轶事逸闻；……凡此种种皆令我眼界大开，感同身受，虽间或也有分歧，彼此绝无把个人观点强行对方之事，何等痛快。只可叹笔者才疏学浅，治学上尚欠广度与深度，愧对彼邦良师益友的谬爱。兹不揣浅陋，谨以日积月累的点滴心得体会呈献读者，非敢为人先，笨鸟先飞耳，倘有以教我，则幸莫甚焉。

李德纯

1994.4.24于北京

目 录

I. 流派论

- 一、更新与探索
——战后日本小说……………(1)
- 二、创生与模拟
——战后日本诗歌……………(50)
- 三、丧失与复苏
——战后日本戏剧……………(79)
- 四、第一批报春的燕子
——战后派……………(94)
- 五、人生的扭曲
——无赖派……………(109)
- 六、内在精神的深层开掘
——现代派……………(118)
- 七、在命运的背悖与冲突中激扬人生
——社会派……………(135)
- 八、躁动与倾斜
——城市文学……………(151)

II. 作家作品论

- 九、新旧混杂中的迷惘
——岛崎藤村的《家》……………(163)
- 十、相见时难别亦难
——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女》……………(174)

- 十一、孤独，但却幸福
——石川达三……………(184)
- 十二、爱·美·死
——三岛由纪夫……………(190)
- 十三、苦涩中的深沉美
——井上靖……………(211)
- 十四、人性和生命的火把
——司马辽太郎……………(232)
- 十五、自主意识的朦胧觉醒
——有吉佐和子的《非色》……………(246)
- 十六、推理小说的新纪元
——松本清张……………(253)
- 十七、对传统的亵渎
——石原慎太郎……………(273)
- 十八、审美的困惑
——原田康子的《挽歌》……………(283)

Ⅲ. 附录

- 开拓者：异化和荒诞的涌动
——献给安部公房的安魂曲……………(288)
- 不知疲倦的探索者
——悼念有吉佐和子……………(300)

I.流派论

一、更新与探索

——战后日本小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处于极其深刻的历史性变化，整个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最广泛最深刻的变革，民族精神获得了解放，文学艺术对饱经忧患的日本民族来说，标志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战后初期，日本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明显特点是，战前久负盛名的老作家纷纷提笔写作，打破了文坛的沉寂，拉开了战后文学的帷幕。新的文化机制在萌生，在发育、在壮大、开始出现了回归艺术本体的倾向。

战前，在军国主义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时期，自从明治维新以来，将近80余年所建设的社会文化，因政治粗暴干涉，导致了20余年动乱的大倒退，文学的主体性横遭践踏，形成文化精神的失落和传统文学力量的消泯，不仅抑制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生命本能的冲动，而且使作品往往衍变成武士道观念的载体和图

解，沦为现代造神、颂神运动的工具，文学虚假的粉饰超现实的神性，造成了文学断裂和作家断代。某些作家的人格异化，匍伏于军靴与军刀之下，不仅失去了价值判断，还丢失了道德勇气，出版的一些作品基本上为一种非文学的沉闷气氛所控制，奉行的文学价值观念，带有极强的政治功利性质，将审美和娱乐作为推行其法西斯政治的手段和工具，粉饰生活，带有极大的虚伪性，践踏了文学的独立价值形式和地位。

一个民族的审美精神处于普遍的麻木状态下，民族的生命力也会因此而枯萎，并陷入文化中衰以致毁灭的困顿之中，表现手法也难以经过特殊高超的艺术处理。

当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册又翻过了半个世纪之后，长期的文化饥荒，使战后初期的读者如饥似渴地寻求书籍。感到匮乏和贫乏是一种觉醒，也是对战前断烂惨败的记录违悖艺术规律的严酷报复。各种刊物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这些刊物竞相发表在战时洁身自好、息影家园的老作家在战争期间不可能发表的旧作。在他们正经历着一段十分艰难的岁月中，虽不乏保持独立人格、只求文学真理而不屈服政治压力的作家，而多数作家知识博大精深，却少有批判性和创造力的思想，有使命感而无独立独特的勇气，面对手中的笔感到惆怅和迷茫。前面谈到的第一类作家，在当时异常的政治环境里，宁愿受法西斯政权怀疑乃至责骂也不摧眉折腰，潜入生活的急流观察、思考，执著地固守文学的寂寞清贫之道，坚持着半“地下”的创作准备。战后，他们迎来了文学的春天，文学的魅力和凝聚力仍然表现在几位大师身上。

谷崎润一郎在《细雪》（1946）中，选择了大阪船场豪门望族蒔冈家四姊妹的不同命运这一独特角度，以浓郁的关西地区风韵和纯正的地方语言勾画了关西的一段旧事，为人们展现了一幅朴素纯真又极富人情风俗画卷。四姊妹既有独特的个性，又有时代和家庭所赋予的共性。她们都在追求幸福的爱情，却因性格各异和命运安排错综复杂，走着不同的人生道路。老作家通过这个

布尔乔亚家庭裂变、组合过程中的描写，展示在动乱年代四姊妹在爱情诸多方面的变化。永井荷风善于从凡人小事中提炼深刻的内涵，并重视形式美的构成，使内容与形式得到完美的统一。他把东京市井百姓的众生相，不枝不蔓地结构在小说的情节与场景中，是很可贵的。他在《勋章》（1946）和《舞女》（1946）中，采撷了一朵朵温馨美丽的小花，把东京浅草地区渲染得异彩纷呈，富有庶民的生活气息和情趣，不带有功利色彩，自由地描绘自己的观察和心灵感受。他笔下的贫民窟小贩和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舞女，由于作家透过民俗风情表达了这些下层人物的个性形象和喜怒哀乐，使作品有了感染力。这些小说在描写小人物的不幸遭际同时，着力剖析了他们的心灵，显示了平凡人物身上潜在的力和内蕴美。从他们貌似低沉消极中透出沉闷和黯然，似乎忍受着生活的重负与艰辛，流露出对小人物品格的赞扬，希望他们都能过上美好生活。

战后文学基本上是以长年动乱的艺术空白为历史特点。上述作品都是在白色恐怖笼罩日本文坛最黑暗的40年代，或发表一半遭禁，或冒着查禁的风险，以执著的精神，充分的自信坚持执笔写完，是劫后犹存的名篇。战后初期，这些涉及从前被查禁的题材的小说大为畅销。其他老作家出于动乱年代失去攀登艺术高峰大好时机的惋惜，多年被压抑的创作欲望如喷泉奔突而出，以其鲜明的艺术风格，独到的艺术表现手法，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表达了心中的感受，如有“早稻田文学领袖”之称的丹羽文雄、舟桥圣一、继续以平易诙谐的笔调描述艺妓和酒吧女郎等凡人小事的“风俗小说”，描摹现代城市小市民的人情世态，充盈着东京“下町”庶民的市井生活和气质，民俗美中蕴含着人情美，人情美中体现着民俗美，展示了平凡世界中的复杂现实和多姿多彩的世态风情。他们的小说较多地注意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写他们的苦乐与奋斗，血泪与挣扎，生老与病死，透过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多舛，从特定的角度折射出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

虽然在题材方面似乎没有多大拓展，但在作品中却把凝重的社会生活同醇厚的民俗交织在一起，向我们展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战后初期的历史画卷，文学的主体性得到了复苏。所谓主体性，主要是强调创作主体对社会人生的独立思考和艺术形式的选择自由，它是从人的主体意识引伸而来的，尤其是作为战前人的主体沦丧的反动，它的走向是积极的。作品带着历史的沧桑感，回忆自己经历过的生活，或以人性的演变衬映历史的衰微的弧线；或以自己的见证观照历史的偏差与失重。

战后初期，日本正处于历史性的大转变时期，困难与希望交织，带给文坛的却是文学艺术的春天。一旦文化转机过程开始新的阶段，文学也必然会从人的创作活动中获得新的动力。就整个文坛而言，在当时世界文化的总背景下，面临着价值的重新评价与转换，以适应战后的新形势，似乎都在追求新的力度。战后初期曾给作家以长久寻觅终于获得的契机，去思考与评价历史功罪，并以良知和热忱呼唤出久蕴心底的声音。自然生命的呼唤，对自然道德的弘扬，有力地批判了旧秩序制约下的扭曲、不健全的人生和社会的伦理道德。这时期的作品最根本的思想内容是对法西斯横行年代所造成的各种创伤的揭露，反思法西斯对人的压抑、扭曲、戕害本质，也是对人的尊严、自由、价值的民主权利的肯定和呼吁。对法西斯政治的否定实质是一种历史否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夏目漱石的入门女弟子野上弥生子，在短篇小说《狐》（1946）中，以深沉的忧虑和愁思，描写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自“九·一八事变”后一贯反对日军武装入侵中国。太平洋战争前夕，为逃避兵役，称病蛰居山村养孤为乐。每当想起肺病“一旦痊愈，又会被拉去打仗，便产生绝望”，甚至认为因病死去，反而是一种“轻松的诱惑”，表现了在复杂的生存环境中，冲破樊笼追求美好生活，却又无法逃脱社会造成的悲剧。林芙美子的《漩涡》（1947），描写了阵亡士兵家眷经历的兵戈离乱生活和战后坎坷生活道路上的有气无力挣扎。正宗白鸟的《战争受害

者的悲哀》(1946)和宇野浩二的《回忆草》(1946),以凝滞而庄重的笔墨,描述了知识分子在日本政治最混乱、社会最痛苦年月的乱离疾苦,难以挣脱时局对他们的追踪。以上短篇注重的不是故事性,在散文的叙述中去体味人生。无产阶级女作家宫本百合子的《播州平野》(1946)、《风知草》(1946)、德永直的《妻啊,安息吧》(1946)和壶井荣的《没有母亲的孩子和没有孩子的母亲》(1951)、《24只眼睛》(1952)等,都是战后民主主义文学的名篇佳作,由于这几位作家拥有过去经验和创作经历的积淀,对既往的生活和历史一般有比较深切的体验和了解,历史和现实的对比和反差必然十分强烈,这又是激发深刻的思想和卓越见解的契机。从更深一个层次上说,这一切可以成为作家辩证地处理社会人生问题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料。宫本百合子在上述两篇小说中,根据自己的经历加以艺术概括和加工,以细腻情感和不同于一般女性的宏伟气魄,表现了人类前仆后继追求光明与幸福的精神,焕发出鲜活热烈的生命力,以及她走上革命道路后对事业的执著追求、挫折与困难,欢乐与痛苦,表现了女作家对停滞和黑暗年月的愤懑,冷静的生活冰层下面,奔涌着熔炼千古的地火。德永直的小说,以作者妻子战争期间身心经受难以历数的磨难,空袭中不幸逝世,以抒情散文诗体诉说了灾难将历史引向歧路年代不可名状的悲哀。壶井荣是一位充满母爱和高雅气质的女作家,她的《没有母亲的孩子和没有孩子的母亲》曾获1952年艺术院奖,作品色彩丰富清新,充满童稚与欢乐。女主人公寅大娘的独生子,作为少年飞行员血溅蓝天,丈夫在美军一次空袭中葬身火海,她只身回归故里,收养一名孤儿。母子之情的柔丝,把两颗破碎的心重新缝补,这部短篇的诗情在于蕴寓其中起着主导作用的积极的精神因素,人与人之间由精神、情感、品德汇合而成的暖流,一种在平凡、艰苦的生活中注入的美。《24只眼睛》与此互为表里,是在一个理想的天空,达到了一个理想的结局。50年代经久不衰的畅销书,曾掀起一股“壶井荣热”。不同的感情深度,往往使形象

显出极大差别，而师范学校毕业来到偏僻小岛执掌教鞭的大石久子，热爱教育事业并极富社会责任感，怀着一颗真诚的心生活在孩子们中间，把全部爱心都给了孩子。她纯洁美好的心灵，温暖着12名一年级学童天真纯洁的灵魂，一片温馨使教室满堂春风，她决心绝不让这24只心灵之窗——眼睛受到玷污，扬起贡献的风帆，把青春献给海岛的教育事业。恬静的情感律动，生动的心灵妙悟，经过作者的提炼达到诗意的升华。然而，那场不义战争摧毁了玫瑰色的校园梦，若干年后，5名同学应征入伍，2人遇狙殒命，1人双目失明。在战后废墟，故人久别重逢，干戈玉帛，弹指沧桑，风物依旧，往事如烟。重温孩提时的旧梦，无限眷恋，恍如一场噩梦。悠悠人生妙悟，透过艺术表层展现出深层的隐意，大石久子和学生们仿佛从梦中归来，这小岛如今静得象没有一点儿涟漪的春水那么柔和，他们都进入了洋溢着稚气的境界里。作者以深邃丰厚的思想内涵，展露了炼狱般岁月人们的沉重精神负担，字里行间洋溢着忧患意识和激愤，是感情与鲜血凝成的历史画卷，也是写给成人看的“童话”。作者在处理人物和自然背景上，着重于人物的内心刻画；在人物形象和故事结构中，则置重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开掘，体现出艺术形象所蕴含的巨大激情。这是一部感情色彩很浓，艺术品位很高的精品，始终表现着人类生活中善良和美好的师生情谊，是一本能使你眼睛潮湿，读后又能掩卷沉思的小说，使人心灵得以净化。

高度的幽默是喜剧的灵魂，而幽默的本质在于以微笑的态度来批评现实。井伏鱒二的《遥拜队长》（1950），精心地把握了这个分寸，在外表喜剧的气氛下，多含有哲理的忧伤。主人公冈崎悠一在二战中被驱往马来亚作小队长，战后复员回到农村，仍保持法西斯军队的一套习气，引起村民的厌恶。作者牢牢把握住喜剧人物“性格的乖讹”，不仅写出了冈崎准确的性格外化的行为，更刻画了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节奏，把那些可笑可卑的性格，穷形极象地揭露出来，让人们在笑声中否定它，鞭挞它，正如马克

思所说：“是为了使人类笑着同自己的过去告别”。小说中大量的俚言俗语，土得掉渣子，地方性、动作性、个性强，不乏幽默，谐谑迭出。

田宫虎彦的《画册》（1950），则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战争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中学生福井义治仅仅因为哥哥被俘，便饱受世间的鄙夷、冷漠和不公正，战争碾碎了他对生活的稚朴幻想。义治的悲剧是整个民族悲剧的缩影，也是这场悲剧不可抑制的慢性冲击。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说过：艺术“所要争取的真正喝彩，不是一句漂亮诗句以后陡然发出的掌声，而是长时间静默压抑后发自心灵的一声深沉叹息。……是使全国严肃思考问题而坐立不安”，以上两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这样的艺术效果。

战争是个历史范畴，它的具体内容和特点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它是古老的，也是常新的。从人性的角度审视战争，既是人类进化血与火的洗礼，也是社会前进的歧途；既展示人性善的辉煌，又呈现人性恶的晦暗；以杀人来爱人，以毁灭来建设，是人类社会的最大悖论。表面上看，上面所提到的作品并没有通常习惯的金戈铁马，折戟沉沙，更没有概念化的战史演绎或阐释某种战略思想和战略意图，似乎把战争具体时空推到遥远而又模糊，沉湎于个人的悲欢吟喟，然而，不少作品自觉地追求历史的纵深感，通过再现战争年代的生活，在历史的回溯中，揭示军国主义酿成生活悲剧的沉重教训，为这类题材小说的创作平添了几分严峻与沉重。同战前的作品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文化上的落差，不仅表现出文明对于其前身的骄傲，而且通过这种人类文明的文化反顾，~~使人~~让人感到战后文化居高临下的优越，然而，它又不是凭借审美的中断所造成的陌生感和新奇感而风行一时。正如日本文学评论家本多秋五所指出的那样：战败投降是日本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事；战后文学应从世界观和人生观两个方面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以防止历史重演。因此，作家应写战前所缺

乏的那种新精神^①。松原新一也指出，战后文学无论在思想内容和创作方法上，都同战前发生了本质上不同的新面貌^②。大江健三郎所说“日本现代文化史中欠缺的东西，正是战后文学家所刻意追求的东西”^③，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文学在大正后期和昭和初期的社会生活中，曾经是一个灿烂夺目的形象。战后，社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文学使命、文学功能和文学价值的变化，文学在战后新的文化背景中，回到了它自身应有的位置上，深切的忧患意识和犀利的批判锋芒，作为文学的精神内核，而使文学获得生命力。

文学灿烂的新时代，将由新一代作家来创造。战后不久，一批经历相似、文艺爱好接近的青年作家，在《近代文学》杂志本多秋五、平野谦、荒正人、佐佐木基一、小田切秀雄、埴谷雄高、山室静等文艺评论家的指点迷津和重点提示下，犹如一股春风，带着崭新的思想内容和飞跃流动的意境，进入当时正处于再生期的日本文坛。上述有“七武士”之称的评论家，大都参加过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驰骋于评论园地，在军国主义的白色恐怖面前未曾屈服，在思想感情和经历上，同战后派有一脉相通之处，向他们指明了奋斗的目标和前进的方向，对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培养文学新人，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他们修养有素，有较深的生活根底，他们的某种审美意向中，对人们在战后新时期，对观念变革所引发的本质问题作出了深刻的反省，使这时期的评论工作走在创作前面。战后派借鉴风靡西方的现代主义手法，通过作者亲身经历的某阶段的一些活动，从一个侧面探讨在

① 本多秋五：《战后文学的作家与作品》第370页，日本冬树社1971年版。

② 松原新一、矶田光一、秋山骏：《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第53页，日本讲谈社1978年版。

③ 《世界》杂志1986年9月号。

战场和监狱面临生死悠关时刻，人生价值的深入思考。无论在创作思维、主题选择、人物形象、情节设置、艺术手段甚至语言特点等诸多方面，都与战前作家迥然相异，具有鲜明的战后特色，故称战后派。暴风雨的艰难时代，带给他们的是失败和伤残，战后派以文学创作来抒发自我感情，表现赤裸裸的个人所爱所憎；作家们以文学语言切入到人的心理深层，刻画人在社会理性准则压抑下无法表达的渴望和追求。他们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外部观照的复写转向内心秘密的揭示，确是日本小说的一大转折和进步，在艺术上由外向走向内视，无疑是对艺术真谛的深入把握，实现了文学性质的转变，承担起战后文学运动中的思想启蒙工作，建构起新的审美精神。他们承担的启蒙任务相当复杂，通常来说，启蒙的主题也是时代的主题，把时代的主题演化成创作的主题思想。战后派的锋芒所向，是以战前法西斯的意识形态为基础和核心的蒙昧。他们试图用理性消除蒙昧，这是战后文学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野间宏的《真空地带》（1952）、《阴暗的图画》（1946）、《脸上的红月亮》（1947），以及椎名麟三的《深夜的酒宴》（1946）等，是战后派文学中早有定评的佳作。如果作家本人心灵不震撼，是写不出令人震撼的作品的。战后派作家的许多小说，多层次地刻画作品人物的心理变化脉络，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具有强烈的当代意识和超越题材之外的重要意义。人的生活和命运，人和他周围世界的关系，始终是战后派瞩目的中心。忘记这场战争是一种罪过；牢记它将会产生一种永恒的敦促力量，将内心的震撼和愤懑化成为深沉的思考，不动声色地讲述战前法西斯造成的悲剧，是战后派作品的基调，使人感受到生命与人格被撕裂的痛苦；一次次地召唤人们反顾历史，引发人们思索几成宿命的民族运数。这种批判主要基于理性的反省和彻悟之上，以其文化批判与艺术创作在新文坛上独领风骚，为刚刚复苏的日本文坛注入了一种活力，形成为战后文学发轫期的主流。他们以自己的作品，交给时代与社会一份耐人深思的答卷。战后

初期，作为时代的逆反，处处充满了诀别意识，在文学领域提供具有陌生感的文化信息是大势所趋，读者的殷切翘盼。没有陌生感就难以迸发出重建日本人人格结构的强劲刺激力。战后派之所以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某些创作手法，也有特定历史环境的原因。毋庸讳言，这次大更新是在西方工业国家的坚船利砲的轰击下开始的，是伴随着血与火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开始的。日本法西斯统治下的文明，终于迈出了向民主文明转换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然而，当时的社会对人民大众摆脱军国主义的压迫的需要，远远超过了对文化机制大更新的需要。

总的来看，这类题材的作品引起极大的社会轰动。对二次大战虽然还停留在单一的价值取向和浅层的艺术思维，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怀旧”的时间意识的一种反拨和批判。他们对自然生命的呼唤，对自然道德的弘扬，有力地批判了战前军国主义长达半个世纪的思想制约下的扭曲、不健全的人生和社会伦理道德，寻找和礼赞“失乐园”中真善美的同时，却忽略了对战争作出政治、经济、道德、历史乃至文化和人性的综合把握，在多元的审美价值中，完成对人性的沉落与升华、毁灭与重建过程的深度透视。由于题材的限制，多置重点于主观感性世界的倾吐，不可避免地格调低沉。诚然，动人的旋律不一定是歌颂体，有时一曲悲歌，一次深沉的反思，也能震撼灵魂。如果这类作品能从整体上，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深入探讨和剖析这场悲剧的内在原因；倘若对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给予必要的批判，也许会具有更加发人深省的思想艺术力量。

随着时代的发展，控诉军国主义的阶段业已过去，表现战后各个社会层面人物的命运和心态变化，开始把视野推向多方位，直面生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追求不同的格调和形式。从战前就积极投身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老作家，并没有在生活 and 创作的道路上停步不前，仍以直面社会和人生的严肃、真诚的文学精神笔耕不辍，时有佳作问世，显示出一种成熟和飞跃。他们根据长期